

- 
- The Schreber Case
 - Dora —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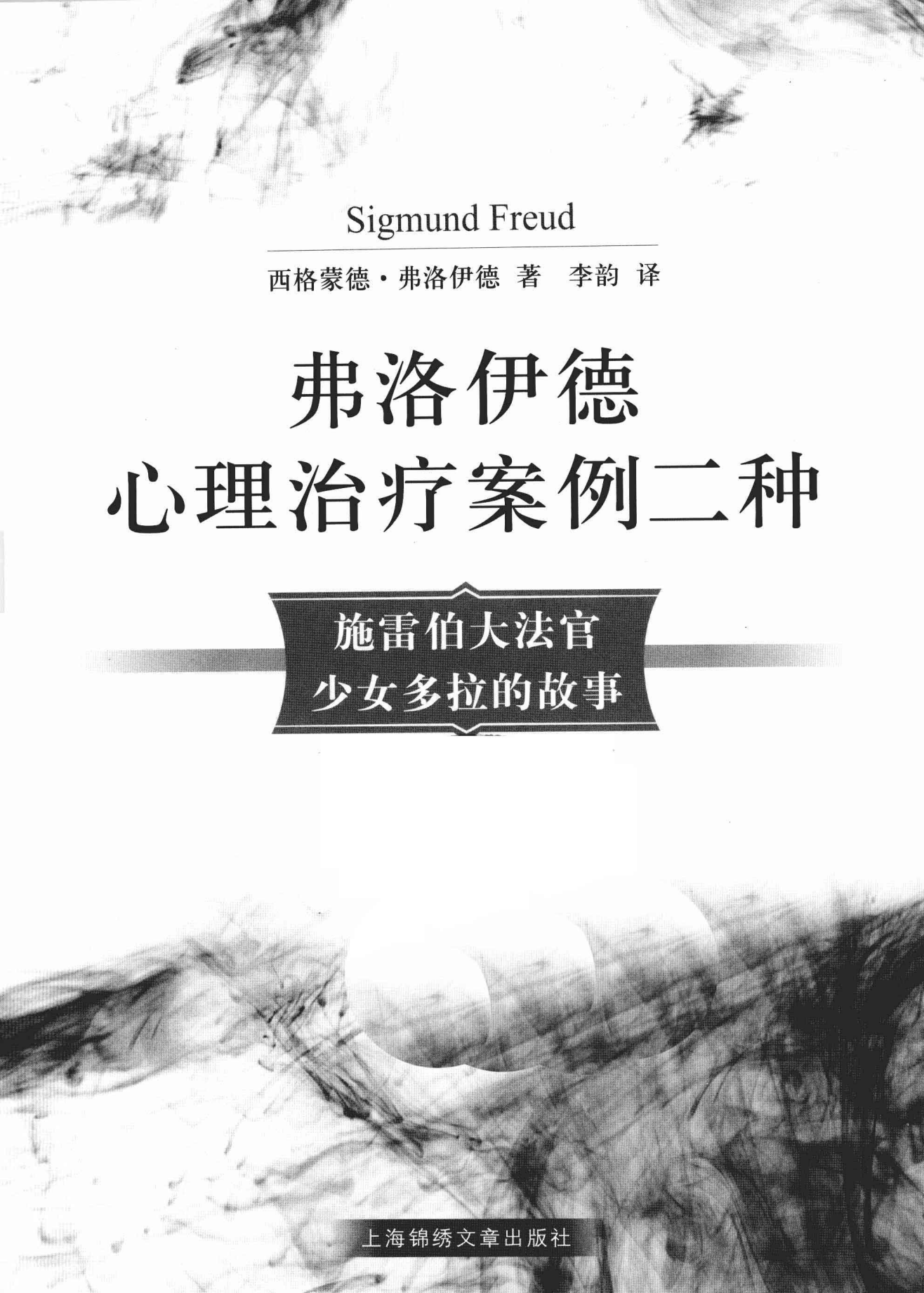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李韵 译

弗洛伊德 心理治疗案例二种

施雷伯大法官
少女多拉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Sigmund Freu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李韵 译

弗洛伊德 心理治疗案例二种

施雷伯大法官
少女多拉的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二种/(奥)弗洛伊德(Freud,S.)著;
李韵译.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452-1039-2

I. ①弗… II. ①弗… ②李… III. ①精神分析—案例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4781 号

责任编辑:吴 迪
封面设计:夏侯政

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二种

著 者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邮编 20004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039-2/J·661
定 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517029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弗洛伊德 心理治疗案例二种

施雷伯大法官
少女多拉的故事

- 
- The Schreber Case
 - Dora—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目 录

施雷伯大法官 / 1

导言 / 3

一、病史 / 5

二、解析 / 22

三、论妄想机制 / 40

后记 / 55

少女多拉的故事 / 57

一、关于歇斯底里症之一例的分析散记(1905) / 59

(一) 前言 / 59

(二) 临床表现 / 64

(三) 第一个梦 / 101

(四) 第二个梦 / 123

(五) 后记 / 137

二、论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与双性恋心理的关系(1908) / 145

三、论歇斯底里的发作(1909) / 150

施雷伯大法官

取材于自传的妄想症(妄想性痴呆症)病例精神分析备忘录

导 言

分析研究妄想症,像我这样在非公共机构就职的精神分析师总是会遭遇一些特别的麻烦。我们无力接收身受此种紊乱困扰的病人,即便有,也无法长期留住他们,因为,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表明我们有能力治愈疾病,则很少有病人愿意接受治疗。所以说,我很少有深入观察妄想症的病理结构的机会,而即便有,也总是附带这样那样的条件——有时是在结论还很不明朗(到达这一步也并非易事)时即遭遇干涉,要么就是因为顺从了病人亲属的要求,答应不求确诊地松散治疗。当然,单说接触妄想症患者或痴呆病人的机会,我其实倒也很多。对于这一类病人,我的所知也并不比其他精神病学家更少。然而仅此还远不足以得出分析结论。

要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妄想症,若是研究对象并没有特别暴露出某些通常会被其他类型的心理疾病着力掩藏的东西(也许是以扭曲的形式),那么研究就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不论使用何种办法,我们都不可能强迫妄想症患者去战胜他们自己内在的阻抗;不论是在何种情况下,他们也都只会说出他们愿意说的话。所以说,就这种精神紊乱的情形而言,阅读一份书面总结或公开病史,可以说也就相当于同患者直接接触了。面对某个我素未谋面的妄想症患者(也即身患妄想性痴呆症的病人)的病例,我并不打算否决分析阐释的做法——但有个前提:这部病史必须是由病人本人写成并亲自展示在公众视野中的。

现在我们手头的这个病例,是关于撒克逊地区法院的前首席大法官、法学博士丹尼尔·保罗·施雷伯的。他的作品《一名心理症患者的备忘录》在1903年出版发行。据我所知,这本书的面世在精神病学家当中曾引起广泛的关注。这位施雷伯博士很可能至今仍健在,并且早已走出了1903年时期的妄念体系,所以本书中关于他那本著作的评论很可能会给他带去痛苦。不过,只要他仍保持着当初的信念,我就可以援引他本人曾经的论述来支持自己的做法——正是他自己的这些论述,曾被这名“思维敏捷、洞察敏锐且智力超群的男子”^①用来驳回那些试图制止他将自己病情公之于众的建议:“在公开出版



导
言

① 这段明显并不公允的自述出自施雷伯的《备忘录》。



这件事上,我从未欺骗自己不去注意那些消极面的考虑——尤其是关于几个至今仍健在的人的考虑。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有幸遇到某位足够资格的人来对我的身心和个人命运进行观察研究,则必能有益于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于宗教真理的理解。单是这一原因就足以压倒其他所有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了。”^①他还曾在那本书的另一处明确指出,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坚持公开出版,哪怕这可能给他的医生,即他在莱比锡的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Flechsigt)博士造成麻烦,哪怕后者会以为这是在策划针对他的指控。在此,我想重复一遍施雷伯先生对弗莱希格医生说过的话:“我希望我的私人医疗顾问弗莱希格教授也能和我一样,从科学的角度看待我的这本备忘录,并由此而战胜任何个人的敏感。”

接下来,我将逐字逐句地援引《备忘录》中所有符合我的解析的部分。对于本书的读者,我首先要建议他们至少将那本《备忘录》通读一遍,以熟悉其中的内容^②。

① 出自《备忘录》前言。

② 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做到这一点显然有些不现实。撇开施雷伯博士的《备忘录》是否具有翻译引介价值的问题不谈,首先其原著就已经一书难求,即便是有能力阅读德文的读者,恐怕也难得亲睹此书机缘。在此,我们只能满足于就弗洛伊德的著作阅读弗洛伊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本文实在多有令人不能满意之处,从精神病学角度来说,本文恐怕也已是历史意义大于学术意义。但是作为了解弗洛伊德思想演进历程和上世纪初精神病学理论概貌的窗口,本文还是意义非凡的,而文中大量生动的病况描述和精彩的分析推理,更是让我们的阅读变得饶有兴味。——译者注



一、病史

“我曾两度身患神经疾病，”施雷伯博士说，“两次都起因于智力上的过度衰竭。第一次(当时的我正在切尼兹主持省级法庭的工作)是因为我正为国会辩护，第二次则是因为在工作中遇到了罕见的沉重负担，当时我刚刚接受新的任命，到德累斯顿出任地区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第 34 页)

病人的第一次发病是在 1884 年秋，到 1885 年底彻底治愈。那时候，这位病人在弗莱希格医生的诊所里度过了半年时光，据这位医生在后来提交的一份《预估报告》中的描述，那次发病是一次严重的忧郁症发作。施雷伯博士也证实说，他的那次疾病发作过程是“不带任何超验色彩的”(第 35 页)。

不论是病人的言辞，还是医生附加的评论，都没有提供足够的关于病人早年历史及生活状况的信息。我甚至都还不知道病人发病时的年龄。不过，从他在第二次疾病来袭之前即已在司法业内登上高位这一点来看，我们倒是可以估算出他大致的年龄下限。我们知道，身处“忧郁症”时期的施雷伯博士已经成婚多年。他曾写道：“(对医生)我妻子有更浓厚的谢意，从她崇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弗莱希格医生无异于是将丈夫交还给她的人。因此一直到数年之后，医生的照片仍旧立在她的桌前。”(第 36 页)还有，“自我从第一次疾病中康复之后，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度过了八个总体来说是非常愉快的年头。在这些年里，我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声誉；只是不时地在我们的那个希望——希望我们的婚姻能得到一个孩子的祝福——重新燃起时，方才感到生活有一些暗淡。”

1893 年 6 月，病人得到消息，知道自己即将被委以首席大法官之职。同年 10 月 1 日，他到任就职。在这中间的几个月时间里^①，他做了几个梦，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他不止一次地梦到自己早先的神经疾病重新发作，梦中的他对此非常难过，等到梦醒后，当他发觉那不过是一场幻梦时，又变得兴高采烈起来。还有一次，是在清晨，半梦半醒之间的他“有了这样一种想法：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为美妙的事”(第 36 页)。

^① 那时他还没有被工作岗位累得疲惫不堪，而他自己却坚持认为疲劳才是疾病的肇因。



这样的想法在清醒时候的他看来，一定是难以容忍的。

1893年10月底，第二次疾病在痛苦的失眠中开始了。病人又回到了弗莱希格的诊所，在那里，他的病情迅速地恶化了。这位来自索内斯滕精神病院的医生在稍后给出的一份病情报告中记录了这次疾病后来的发展情况（第380页）：“在他刚到这里的时候^①，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忧郁想法，还不断抱怨自己正深受脑组织软化的折磨，而且将不久于人世。迫害念头也已经混入了总的临床表现（clinical picture），这要归因于感官性错觉——也即妄念（delusion）——的出现（尽管这些妄念在一开始是受到隔离的），以及同时出现的严重的感觉过敏——病人对声音与光线极度敏感。一段时间后，视觉和听觉上的错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些妄念和一般性骚乱（coenaesthetic disturbances）一道，控制了病人所有的感觉和思想——他以为自己即将死去，瘟疫在他体内肆虐，身体正在腐烂，正在经受所有骇人的折磨；他反抗，于是所有那些怕人的事情就变本加厉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这种病态的思维对病人的控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会硬挺挺地连续坐上几个小时，一直处于幻觉的昏迷状态，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无反应。与此同时，病态思维带给他的折磨也非常深重，竟让他宁愿死去——病人多次尝试在浴缸中自溺，还要求‘那些给他准备的氰化物’。渐渐地，病人的这些妄念开始呈现出神秘化、宗教化的特征，他认为自己跟上帝建立了直接联系，但也同时被恶魔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看见了‘不可思议的幻影’，听到了‘圣洁的音乐’，并最终生出了这样的信念：他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中。”

需补充的还有一点：病人咒骂过一些人，因为他以为这些人正在追逐他、加害他，首当其冲的就是病人过去的医生弗莱希格——病人一边骂他“灵魂谋杀犯”，一边又不断大声呼喊“小弗莱希格”，并在发音上对这称谓中的第一个字大加强调（第383页）。在1894年6月，刚在别处短暂停留一段时间的病人离开莱比锡，到达皮尔纳附近的索内斯滕精神病院。之后他就一直待在那里，直到病情彻底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病人的临床表现转变了很多，对此，该院主任韦伯医生有极精确的描述：

“无需对疾病发展的细节作进一步的深入描述，只需一句话就能把这一切

^① 此时病人正在莱比锡弗莱希格教授的诊所里。



说清：从一开始，病人身上就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错乱；这种给他的整个精神带来极大损害的错乱可被归为幻觉性癫狂（hallucinatory insanity）的一类，其影响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形态也逐渐清晰——这也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妄想症临床表现（Paranoia clinic picture）。”（第 385 页）一方面，病人建立了一套巧妙的妄念机制，那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加以特别关注的；另一方面，病人的性格又已经完成了对其自身的重建与展示，它跳出了那些古怪的困扰，而且完全有能力应对生活。

在韦伯医生 1899 年写下的病情报告中，他曾这样写道：

“现在，除开那些只要匆匆一瞥即能让观察者过目难忘的精神运动征象（psychomotor symptoms）以外，大法官施雷伯博士的情况看来既不是困惑，也并未向精神上的禁抑屈服；另外，他的智力也丝毫没有减弱迹象。他善于思考，记忆出众，他知识面极其开阔，不仅限于司法专业，还广泛涉猎许多其他领域；不仅如此，他还拥有在这些知识中整理出清晰脉络的能力；他关心政治、科学、艺术，而且不断地沉浸在这些事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上述这些领域内，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会让对他基本状况不甚了了的观察者感觉怪异的迹象。然而，这位病人却始终处在一些病态念头的困扰中，这些念头共同构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多少限制住了他的思维；就我们看来，任何试图以客观正确的论述和对事物实际状态的公正意见去纠正病人观念的尝试，都注定无法发挥效力。”（第 385—386 页）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有能力适应生活了。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要求撤除对他的监管令（guardianship order），同时要求出院。韦伯医生回绝了这些要求，并提交了完全相反的报告。不过，也正是这位韦伯医生，在 1900 年提交的一份病情评估报告中对病人的天性及举止作了下面这样一番赞许的描述：“签署者本人得到了所有可能的机会，有幸能在为期九个月的疗程中同施雷伯大法官在家庭聚餐时就各类事务进行交谈。不论谈论的话题是什么——当然，都是不涉及病人的那些妄念的——不论是涉及政府事务，还是司法、政治、艺术、文学、社会生活，以及任何人们可能谈论的领域，施雷伯博士都表现出活跃的兴趣、博雅的识见，以及良好的记忆和敏锐的判断；在伦理问题上，他也展露出令人叹服的理解。同样的，他还表现出良好友善的行为举止，在有女士们的场合他会有适度的玩笑，而对于那些被他幽默



对待的特定事物上,他总能拿捏分寸,保持得体。他也从未把更应该放到诊疗室里处理的事务拿到餐桌上谈论。”(第 397—398 页)病人甚至还以相当专业、相当合适的方式,介入了一桩引起他的整个家族关注的商业事务(第 401、510 页)。

施雷伯博士多次提出申请,试图争取出院。在这些申请中,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妄念,也从未掩藏过出版《备忘录》的打算。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了他自己关于宗教生活的一系列思考,以及这些思考在现代科学的攻击之下的无懈可击的立足点。与此同时,他也坚称自己在妄念驱使下做出的那些行为都是彻底无害的(第 430 页)。在这样一个妄想症患者身上竟表现出了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正确清晰的逻辑,这最终给施雷伯博士带去了胜利。1902 年 7 月,施雷伯博士的监管令被撤销,次年,《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备忘录》付梓出版,虽然只是一个删除了许多极有价值内容的节本。

在那份让施雷伯博士重获自由的裁定书中,他的妄念体系被概括为简单的几个句子:“他自认为受到召唤,肩负救赎世界并重获幸福的责任。要实现这一切,他首先必须把自己从男人变成女人。”(第 475 页)

我们需要一份关于这些妄念之成熟形态的全面描述。可以看看韦伯医生在 1899 年提交的病情评估报告:“病人的妄念体系植根于这样一个念头:他认为自己是背负天命,有责任救赎世界、帮助人类重获幸福的人。他宣称自己的这个使命是通过与上帝的直接联系而得到的,就如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先知们一样。据他本人说,正是他本人在长期所处的那种兴奋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坚决的勇气,令他获得了上帝的注目;然而,这些都是很难、甚至根本不能以人类的语言表述的,因为它们远在人类的经验范围之外且仅向病人一人显现。而在他的救赎使命中又有这样一个必备的关键要素:他必须转变成为一个女人。这意思不是说他希望发生这样的转变,而是更像一道诫命,出自‘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需要;他认为这种转变是几乎无法回避的,尽管他本人更愿意在生活中保持自己荣耀的男子身。但是为了帮助他个人及全人类赢回彼岸的幸福生活,他就必须完成变为女人这一神圣的奇迹。而这一切都要等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之后方才可能实现。病人毫不怀疑地坚信:他就是被那众多的奇迹选中的唯一一人,而那些奇迹也就是他在之前的许多年里曾时时刻刻身处其中的;因此他就是所有在这世上生活过的人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个。那个



同他交谈的声音则成为这一切的证明。在他患病的最初几个年头里，他身体的一些器官曾遭受损伤；在他看来，这些病变会在不久之后导致其他人的死亡，而他自己则多年活在没有胃、没有肠、几乎没有肺、食管支离破碎、没有膀胱、肋骨粉碎的状态中，而且时不时会把部分喉咙连同食物吃下。不过，神圣的奇迹（‘圣光’）总是会为他修复那些遭到破坏的部分，所以，只要他还保持男子身，他就是不死的。到这时，那些危险的成分已经消失很久了，但是病人的‘女性气质’却取而代之，大步走向前台，尽管这很可能是个要持续数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的话——方才能完成的过程。所以，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也就很难享受其善果了。病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大量的‘女性神经’已经进入了他的身体，并将在上帝的亲手栽培下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直到那时他才可能死去，并同时为自己和全人类再次赢回幸福。与此同时，他还听到各种声音。太阳、树木、飞鸟——那些类似于‘先人灵魂的奇迹的残余’——都在用人的声音向他说话，奇异的东西也都在他周围显出形迹。”（第 386—388 页）

何其错乱！主治精神医师需要的是明了妄念的作用效果，掌握妄念对病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一旦达到这个目的，就不需要过多关注表象了。关于精神心理症的知识告诉我们：即便是怪异如施雷伯的思路，也都是从心灵的最一般、最易理解的情感中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探寻的是病变的起因及过程。有鉴于此，我们很愿意进一步探索那些妄念的细节及其演变。

（一）

病情评估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拯救者的身份，二是向女性的转变。拯救者的妄念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时常作为宗教性妄想狂的核心观念出现。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救赎只在病人完成变性之后才实现。这很特别，也很让人吃惊，因为它和病人的幻想所试图复制的历史神话大相径庭。表面看来，我们似乎的确应该接受那位医生的判断，同意这个错乱情结的成因就是扮演拯救者角色的愿望，然后进一步得出去势的目的只可能是为实现愿望的结论。当真如此？研究《备忘录》，我们却能得到另一种理解。在那本书里，变性（去势）才是最初的妄念，开始它是一种痛苦的伤害和迫害，直到进入后来的疾病阶段方才同拯救者的角色扯上了关系。无可置疑的是：在一开始，妄念是直接臣服于性意图的；为更高的意图服务并非它的原初目的。简而言之，其实是病



人的性迫害妄念被逆向转化成宗教自大狂症。最开始是医生弗莱希格教授担当着迫害者的角色,随着病情的发展,上帝取代了他。

在此我要把《备忘录》中的一些删节公开出来,让读者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出现了一个针对我的阴谋(在 1894 年三四月间),其基础在于:我的神经疾病是不可治愈的。因为如此,他们打算把我交给某个人,确切地说,是把我的灵魂丢给他,并把我的身体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同样丢弃给那个人,供他施行性的虐待^①。接着,我会被简简单单地‘丢下,躺在那里’,那意思无疑就是说,丢在那里等待腐烂。”(第 56 页)(这是在扭曲前文提到过的那种为维护世界秩序而变成女人的妄念。)

“当时人类的视角仍旧左右着我,所以我会有一种观念:我应该将弗莱希格教授或他的灵魂看作我的敌人(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后来又要再加上 V. W. 的灵魂),而万能的上帝则是我天然的同盟;上帝的能力无往不利,只在弗莱希格教授面前受到抑制,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力量支援上帝,哪怕牺牲自己。至于那个谋杀我的灵魂、败坏我的身体的阴谋,如果那不是上帝的安排,那么他至少也是知道的。我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想到这一点的,确切地说,是我在写作本书时。”(第 59 页)

“所有那些谋杀灵魂的企图、那以对抗世界秩序为目的的阉割去势(注 34)^②(这其实就是个人性欲的牺牲),还有后来对我思维的破坏,全部都以失败告终。尽管我经受了許多艰难困苦,我还是在这场以孤身一人对抗上帝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其原因就在于世界秩序是站在我这一边的。”(第 61 页)

在《备忘录》的注 34 中,还有施雷伯关于那个去势妄念及上帝关系的另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去势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即与世界秩序达成一致的目的。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将在后文中详述。”(第 61 页)

这段论述至关重要,它是帮助我们理解去势妄念及整个病例的钥匙。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病人耳中的那个“声音”总是告诉他,变性将给他带来性的羞耻。一旦变性,那些个声音就有了嘲笑病人的理由。“鉴于我向‘施雷伯小

① 根据这里的上下文以及其他的一些段落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提到的这个将要对病人施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弗莱希格医生(参见下文)。

② 那是弗洛伊德对施雷伯《备忘录》的注释。



姐’的转变显然已经迫在眉睫，上帝的圣光^①就总是认为有理由对我加以嘲弄。”——“而那个允许他自己被……^②的人，竟自称为前首席大法官？”——“你难道不会在你夫人面前感到羞耻吗？”

在这里，去势幻想的本质被进一步挑明，而这个幻想在最初并不涉及拯救者角色的原因也大白于天下。答案就是那个一开始就有的“想法”：以一个女人的身份经历交媾定然是一件更加美妙的事（第 36 页）。病人对这种幻想开始有所意识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疾病的潜伏期，也即德累斯顿的繁重工作导致病发之前。

在施雷伯本人眼里，1895 年 11 月就是去势幻想和救世者念头建立关联的时候，而他与前者的和解也就开始于此。“此时此刻我开始意识到，世界秩序无疑是需要这种去势的，不管它对我个人是否适合。那个理智也向我指出，除了同变性的念头和解，我根本别无选择。这并无不妥，因为去势只可能有一种结果：我将与圣光结合，创造新的人类。”（第 177 页）

看来，病人向女性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生命的源泉（*punctum saliens*）”。它也正是那些妄念的源头。事实证明，这也是他的疾病痊愈后唯一留存下来的念头，更是在病人重获自由后的行为中得到表现的唯一一种妄念。“可能让其他人无法理解的唯一一点，就是这样一个事实：我曾被人发现身着女性饰物（丝巾、服装、项链等）半裸着站在镜子前；在专家的证词里这点也被提及。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只在我独处时发生，只要我能够避免，就绝不会让他人看见。”（第 429 页）首席大法官还承认，有一次，当他终于找到一种办法向人们传达自己已经康复的信息之时（1901 年 7 月），他就是以对镜贴花黄的方式慰劳自己的：“现在的我深刻地认识到，我眼前的不仅是‘瞬间完善的人（*fleetingly improvised men*）’，而是真正的人。我必须理智地对待他（镜像），要像一个理智的人在同旁人交往中总是会有表现一样。”（第 409 页）相比较他在履行去势幻想上的主动态度，病人对于救世者的使命就不是那么积极了，事实上，除了出版他的《备忘录》之外，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① 我们将会看到，所谓“上帝的圣光”其实和那个“元素语言”的声音是一样的。

② 这里的省略号是我直接从《备忘录》里照搬过来的，对于那本书里其他所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我也都作了同样的处理。就我个人角度来看，在这样一个严肃的话题上如此羞怯实在是没有必要。